

遗产赋能：玉溪瓦窑社区文化空间的生产实践

何酉崙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中国·云南 昆明 653000

【摘要】文化空间生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创新路径,通过整合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空间价值重构,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兼具文化深度与经济效益的实践范式。玉溪瓦窑社区的个案研究表明,该模式通过三个维度实现文化空间再生产:首先,古窑遗址与陶瓷厂旧址通过空间生产实践转化为具象化的历史景观,完成工业遗产的活态保护;其次,青花瓷烧制技艺等非遗元素被创造性转化为商业街区的空间符号系统,形成文化产业新业态;第三,社区居民生活空间通过适应性调整,形成与文化遗产空间互构的动态平衡。这种三位一体的空间生产机制,本质上是通过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现社区振兴,其创新性体现在双重转化维度——既将物质遗产转化为文化资本,又将非遗技艺转化为生产性保护实践。

【关键词】文化空间;空间生产;玉溪瓦窑社区;玉溪青花瓷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非遗赋能:玉溪瓦窑社区的文化空间生产与乡村振兴研究”(TM-23236868)的研究成果。

一、玉溪瓦窑社区概况

瓦窑社区位于玉溪市红塔区中心城区,东南至胜利社区,西至红塔社区和广场社区,北至泮水塘社区,面积4.72平方千米,因历史上烧制陶瓷而得名。地理位置优越,是红塔区乃至整个玉溪市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该社区于明代建村,清代隶属州前乡、左德乡,民国时期隶属一区。

二、瓦窑社区的空间实践：“活态历史”的物质空间建构

玉溪瓦窑社区的文化空间生产以“空间修复”为核心,通过古窑遗址与陶瓷厂旧址的遗产化改造,构建出融合历史记忆与旅游消费的复合型文化空间。这一实践本质是借助遗产资源重塑城市的文化空间生产模式。

古窑遗址的遗产化进程历经考古发现(1960)、联合发掘(1986)与学术论争三重阶段。葛季芳等学者1960年发现窑址后,1986年联合考古队揭示出三座元代龙窑遗址,证实青花瓷与仿龙泉窑青瓷共烧的工艺特征。2000年羊甫头考古队提出“元末明初至明末”的烧制断代,但学界仍存在“元代说”“明初说”“明代说”的争议。2013年王家山清代窑址的发现,填补了云南青花瓷晚期生产链的空白。在空间实践层面,遗址从考古现场转型为文化地标:1983年列为省级文保后,通过遗址博物馆(1986)实现考古知识可视化;2017年青花街项目运用场景复原技术,将地层剖面转化为文化体验动线,瓷片堆积转化为景观装置,完成学术考据向大众认知的空间转译。

陶瓷厂的遗产化呈现“生产-衰败-消费”的三重嬗变。作为延续600年的生产场域,其元明青花瓷生产在清代转型为

颜色釉陶瓷,1956年集体化改造形成工人社区特质。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导致国有陶瓷厂衰落,2014年《红塔区志》删除陶瓷业条目标志着传统生产模式终结。2017年旅游开发推动空间功能转换:工厂原址改造为青花美食街,部分厂房通过物质形态改造模拟“逝去生活”场景。这种工业遗产化运作既包含对社区记忆的景观化保存,又成为抗衡城市现代化的想象空间。

二者的空间生产均呈现“历史遗存-旅游消费”的改造逻辑:古窑遗址通过“考古展示+博物馆叙事”构建文化地标,陶瓷厂借助工业遗存重塑消费空间。这种空间修复实践本质是资本驱动下的文化资源再造:垂死厂房被注入新生命力,老旧社区升级为旅游景点,遗产成为重塑城市的文化资本。在此过程中,社区公共空间功能从“生产生活”转向“旅游休闲”,形成历史记忆与当代消费交织的“活态历史”场域。

三、玉溪瓦窑社区的空间表征：非遗街区的构想与塑造

瓦窑社区的空间表征以“青花街”为核心载体,通过政府主导的文旅融合策略,将非遗元素符号化并重构为消费性文化空间。这一实践本质是权力话语对空间形态的战略规划,以乌托邦式的非遗“共同体”突破时空限制,实现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本的转化。

青花街的空间生产始于2013年玉溪青花瓷复烧工程,2014年青花瓷烧制技艺入选省级非遗名录后,政府启动青花艺术小镇计划,2020年首期项目落地形成非遗主题街区。截至2023年,街区已入驻60余家文化商户,其中33家聚焦非遗传承,涵盖陶瓷、银器、铜艺、刺绣等多元类

别。空间形态经历了三重演进：从单一青花展示拓展为全市非遗集成窗口，从工业集散地转型为“非遗展示区”，从线性街道升维为融合历史、技艺与现代创新的综合社区。

这种空间表征具有双重特性：在物质层面，通过“非遗+商业”模式构建沉浸式消费场景，将传统工艺转化为可体验、可购买的文化商品；在象征层面，形成超越现实的“真空地带”，将分散的非遗事项浓缩于1.2公里空间场域，塑造集体文化认同。其运作机制遵循全球非遗保护框架——自2004年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非遗保护已从抢救性保护转向系统性保护，非遗社区成为协调经济与文化的新型空间生产范式。

政府的空间规划策略呈现明显阶段性特征：初期（2013-2016）以技艺复兴为核心，通过复烧工程重建文化基因；中期（2017-2020）推进产业化转换，建设博物馆、教育基地等文化基础设施；现阶段（2021-）侧重体验经济开发，二期工程深入瓦窑村内部打造艺术体验区。这种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虽激活了社区经济，但也引发文化本真性与商业化的张力——银器店、美食街等业态的引入，使非遗街区的文化纯粹性面临稀释风险。

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样本，瓦窑社区揭示了非遗空间生产的深层逻辑：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博弈中，文化遗产既是保护对象，更是城市更新的文化资本。青花街的实践标志着非遗保护进入“空间赋能”新阶段，其通过空间叙事重构文化记忆，为传统工艺复兴提供了“博物馆—市场—社区”三位一体的活化路径。

四、玉溪瓦窑社区的表征性空间：社区的适应与调适

瓦窑社区的表征性空间在空间实践与权力表征的互动中动态生成，呈现“资本介入-主体博弈-文化重构”的复合特征。这一空间既非纯粹的物质载体，也非单向的符号投射，而是多元主体通过创造性实践构建的“第三空间”。

旅游化改造催生了空间功能异化：青花街将非遗元素符号化，转化为可消费的旅游商品，导致社区生活空间被挤压，呈现“去生活化”趋势。空间关系网络随之重构，形成政府、资本、游客、外来从业者与本地居民共生的利益生态。这种张力在文创实践中尤为显著——“云溪陶”工作室通过“青花瓦猫”的创新，将传统建筑辟邪灵物转化为文旅商品，消解了瓦猫原有的神圣性，却开辟了产业新路径。市场驱动下，瓦窑社区成为全国瓦猫产品的主要产地，折射出传统文化符号在消费语境中的意义重构。

空间生产进程中，社区展现出显著的适应性调适：早期政府主导阶段（2013-2017），外来资本通过技术移植建立高端工坊；中期（2018-2020），陶瓷厂退休技工以技术反哺参与再生产；现阶段（2021-）则形成多元共生态势——

夜市中既有积压库存的二次流通，也有家庭作坊的自主创新，更涌现出零基础居民的技术习得潮。这种“资本-技艺-生计”的嵌套结构，使社区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空间生产的共谋者。

表征性空间的生成揭示出三重转型逻辑：文化维度上，非遗从社区信仰转化为可交易的符号资本；经济维度上，形成“高端工坊-家庭作坊-夜市地摊”的梯度产业链；社会维度上，重构了“外来者技术输入-本土经验输出-新居民技艺传承”的知识流动网络。这种动态调适既彰显了社区韧性，也暴露文化本真性消解的风险——当瓦猫从屋脊守护神变为旅游纪念品，其承载的集体记忆面临碎片化危机。

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微观样本，瓦窑社区印证了表征性空间的辩证性：它既是权力与资本的空间规训产物，也是草根主体创造性实践的试验场。这种充满张力的空间生产模式，为理解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存续路径提供了鲜活注脚。

五、结论

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本研究揭示瓦窑社区非遗保护的动态三维机制：在空间实践层面，通过“博物馆叙事+商业植入+技术场景”的复合策略，构建活态传承的文化生态系统，推动制陶技艺嵌入现代产业链，形成生产性保护与消费性传承的协同模式。空间表征维度显示，政府以“玉溪青花瓷”符号建构文化话语权，与市场驱动的符号再生产形成博弈，陶瓷工坊创新虽实现符号增值，但面临本真性消解风险，需强化文化创新孵化功能。表征性空间维度彰显社区转型深层动力，居民从生产者转型为文化实践主体，通过重构社会网络推动非遗向“人文资源”转化，使公共空间升维为创新实践平台，本质是文化记忆激活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统一过程。研究表明，非遗传承在城市化进程中呈现“物质重构-符号博弈-主体再造”的互动机制，空间生产理论为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动态分析框架，其揭示的三维辩证关系为城市化语境下的非遗实践建立了理论参照系。

参考文献：

- [1] 王喜轩. 瓦窑工厂再利用为玉溪窑文化体验馆的设计研究[D]. 云南艺术学院, 2021.
- [2] 刘家兴.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展示空间设计研究——以技艺类非遗为例[J]. 今古文创, 2020(11): 58-59.
- [3] 马思妍. 陶瓷艺术在室内空间环境设计中的审美及应用[J]. 佛山陶瓷, 2023, 33(12): 155-157.

作者简介：

何酉崑（1998-），男，白族，云南大学艺术与 design 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